

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探访红军主力会师地甘肃会宁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的会师塔

青砖红墙的会师楼,巍然高耸的会师塔……走进位于甘肃省的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劲柏傲寒,苍松挺立。

甘肃会宁,一块红色热土。1936年10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克服艰难险阻,在会宁和将台堡实现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荣珍说。

铁流汇聚

会师门,过去叫作西津门。“因为红军当年从此门进城,后改名为会师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杨婷说,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纵横十余省份,最终实现胜利会师。

“会宁县文庙大成殿,当年,庆祝红军主力会师联欢大

会就在这里举行。”杨婷讲解道。联欢大会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并号召会师部队“更要团结一心,互相尊重,并肩作战,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欢呼声冲天而起,回荡在会场上空。

“当晚,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杨婷说,县城成了红色的海洋,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三个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李荣珍介绍,大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数万里长征历程的胜利结束。三支主力红军会师西北之际,正是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之时,会师后的红军将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职责。

现在,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角,一份当时的“党员登记表”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表格是手工绘制,党员信息是:李道存,19岁,属于通讯连,籍贯为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红军从会宁离开时,登记表遗留在县城周家大院。为保存这份登记表,当地群众周大勇的母亲把它缝进枕套。1996年,登记表被周大勇发现后并上交相关部门,2000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党旗为证,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战士的坚定信仰,红军才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杨婷说。

鱼水情深

红堡子村,隶属于会宁县郭城驿镇,1936年秋开门迎红军,后被授予“支援红军模范村”称号。“这里地处两县交界处,是红军会师必经之地。”红堡子村党支部书记齐占虎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同志找到当地民兵团团长王瀚,希望允许红军进驻红堡子。

“得知是红军,老人亲自迎。”王瀚后人王东良说,王瀚带领村民升起红军旗帜,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不仅热情款待,还捐献了钱粮和枪支弹药。在一份1936年9月的《红色中华报》上,有这样的报道:“仅在郭城驿一地,就筹集粮食四五百石。”

“红军将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的用的,按价付款。”会宁县政协原副主席王文汉说,红军进城后,有一些住在百姓家。“他们就在院里搭个棚,席地而睡。”王文汉说,吃喝用度,红军记着账,临走前都付了钱。王文汉珍藏了两枚红军付款用的银圆,曾有人慕名前来,出高价收购,“我说,给多少钱都不能卖。后来我捐给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王文汉说。

作风优良一家亲,党的军队得到了会宁人民倾力支持,筹集了大量粮食、钱物。据不完全统计,会宁为红军筹集粮食近500万斤,布匹衣物6380件(匹),还有大批银圆。“全县有400多人参加了红军。”杨婷介绍,朱德总司令在离开会宁时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谢谢父老乡亲!”

悠悠祖厉河,浓浓鱼水情。在一次战斗中,一位红军连长不幸牺牲,村民们以最高的礼遇,安葬了这位英雄。多年来,这位连长的坟墓几经迁移,如今位于红堡子村的一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红军先烈黄连长佚名之墓”。“大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晓得叫啥名,只知道姓黄,是个连长。”王东良说,逢年过节,总有村民到墓前祭奠,85年来从未间断。

新的胜利

有党史研究者曾这样总结:瑞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点,遵义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会宁是红军长征的会合点,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长征胜利结束,新局面就此打开。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936年11月21日在环县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232旅及234旅两个团,以辉煌的胜利展示了红军会合后的力量。”李荣珍介绍,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会宁,一则“小红军救魏煜”的故事家喻户晓。1936年10月9日,会宁城门楼前红旗飘扬,军民敲锣打鼓,准备迎接大部队。当地居民魏鸿儒的儿子,年仅3岁的魏煜,跟着贴标语的小红军战士,来到县城西门附近的一条街上。突然,天空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人群四散,炸弹落下。年幼的魏煜,被小红军挡在了身下。敌机飞走,硝烟散去,人们在牺牲了的小红军身体下,发现了得救的魏煜。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摆放着这位小红军的画像。“为报恩情,魏鸿儒将小红军葬在了祖坟旁,并立下一条规矩:只要魏家还有一个人,就要永远祭奠这位小红军英雄。”杨婷说,魏煜成家后,给三个儿子起名为继征、续征、长征,合起来就是“继续长征”,以此让后辈儿孙记住红军长征的历史和血浓于水的恩情。

继续长征,也寄托着当地群众的美好期待。“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七一”前后,甘肃会宁的很多党员干部都要再次走进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有党的领导,有长征精神,乡村振兴,我们干劲十足。”齐占虎说完,便吼了句村民自编的秦腔,“昔日黄滩绿树阴,盐碱地里能生金”……

董洪亮 白龙 王锦涛 李洪兴



《地球上的红飘带》雕塑

“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走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广场一侧矗立着雕塑《地球上的红飘带》,在阳光映衬下熠熠生辉。

“2006年,红军胜利会师70周年大庆迫在眉睫,会师旧址建设资金缺口很大,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我,担任省内筹措组组长,走访企业100多家,筹集善款700多万元,各项建设得以顺利进行。”谈起旧址建设,会宁县退休干部王文汉如数家珍,“《地球上的红飘带》就是兰州市政府支援60万元修建的。”

王文汉成长于红色家庭,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当时的会宁县百姓缺衣少粮。王文汉的父母王勤夫妇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将士免费疗伤送餐。

“听父母讲,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他们赊膏药,用土药方为红军疗伤。红军将士深受感动,非常信任我父母,于是希望他们帮忙为朱德总司令和直属机关送饭菜,这一送就是22天。这期间的交往,让朱总司令记住了这憨厚老实的一家人。临别时,朱总司令将自己仅有的一把瓷茶壶送给了他们。”说到父母给红军送饭治病的故事,王文汉充满自豪。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受此鼓舞,王文汉的三叔王倦参加了红军。1945年,王倦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色基因成了王家人战胜困难、教育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王文汉的胞兄王文奎在会师旧址义务栽种800余株牡丹,并精心维护;退休后的王文汉投身慈善事业,多方筹措善款善物,折合人民币8300多万元,用于救助家庭困难学生、孤寡老人等,如今已经持续15年。2020年1月,王文汉通过多种渠道为会宁募集12.5万元、5000多只口罩,为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捐助牛奶1600箱。

如今,70岁的王文汉依旧在用实际行动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家风、弘扬红色精神。他说,“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我责无旁贷。”

董洪亮 王锦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骊山北麓,华清池畔,五间厅墙体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兵谏亭侧,游人如织。西安临潼华清宫,在《12·12》西安事变实景演出中,交错的光影让仿佛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

兵谏亭、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安市区不同的角落。如今,再一次走近、聆听,穿越时空的隧道,历史的回响仍不绝于耳。

民族危亡,挺身而出

西安市青年路117号,是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这里原为杨虎城止园别墅,园内二层阁楼已历经80多年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斗拱挑檐。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陈列室,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欢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之所以是历史的转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人,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石八民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策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定期限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当晚,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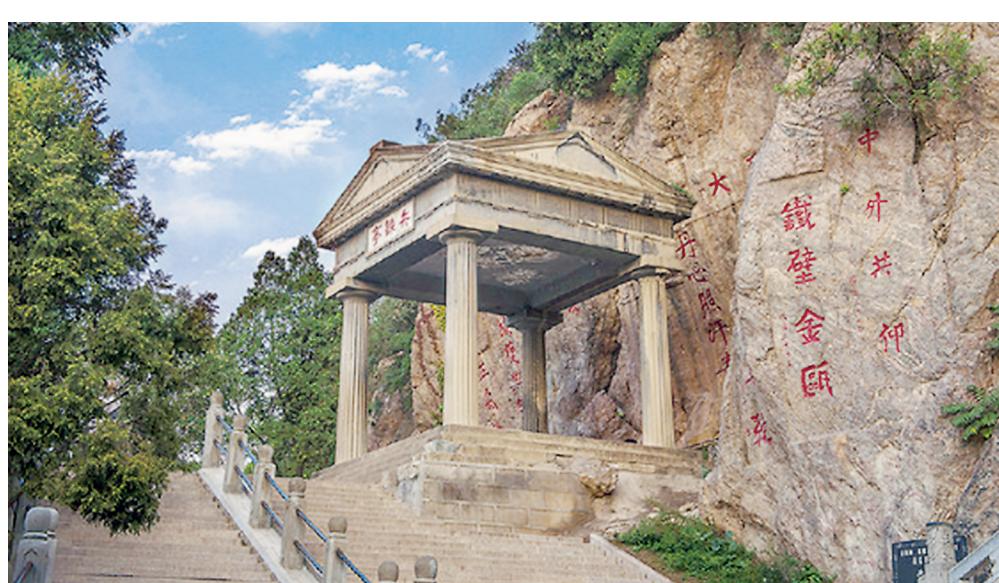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员。”是夜,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汇合,二人共同坐镇指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同时,



兵谏亭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如今,骊山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兵谏亭旁的虎斑石“蒋介石藏身处”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视,仿佛穿越回那个激荡的时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愈加复杂,“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若如此,内战将全面爆发,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西安事变纪念馆讲解员侯敏行指着墙上当时各大报导的报道说。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里陈列着当晚和谈的摆设,塑像人物还原了三方和谈的情景。几名游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在新征程上朝着光明的未来大步前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每个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百折不挠。要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守护好、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

在新征程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秦固

(本版文图转自《人民日报》)